

就只能是按照西方的标准得出结论，中医由西医取而代之了。此概念一经推而衍之，近一个世纪以来，总有一些科学家，甚至大学问家持此偏见。我们不能因此而不承认他们是科学工作者或学问家，同样不能不承认他们是中国的科学工作者或中国的大学问家。我们在认识到他们在认知上的局限性的同时，只能从实践和学理两个方面下工夫，破除迷信，扫除障碍，使我们的文明得以传承和发扬，并与西方文明求同存异。因为中国文化传播延绵数千年，从未间断，无与伦比，而且中西文明确有各自的特点，举其大端，如中国文化重整体综合，西方重理论体系和推理分析；中国重辩证思维，西方重革新发展；中国重人自身的内省，讲入世，西方则向外觅理，讲出世；……两者可以形成互补的关系。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在思想方法上搞得互相排斥，彼此对立，非此即彼，势不两立呢！我们的先人所讲的“和（和谐统一）而不同（同类）”（《论语·子路》），“厚德载物”（《周易·坤卦》），“自强不息”（《周易·乾卦》），正是告诫我们“以人为本”（《爱子·霸言》），“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正世》）。只可惜，我们所知甚少，也很肤浅，自当下大工夫，花大力气，刻苦努力，深入研究，大胆探寻，继承并发扬光大之。

我们坚信，我们只要从自己做起，在现代化，即本土化的进程中，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自觉地投身其中，有的梳理，有的提升，有的综合，有的比较，我们大家只要一点一点地做下去，扎扎实实地干下去，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传统文化的薪火就不会断裂，而只会蔚为大观，大放异彩。其实，现在已经有人做起来了，我以为只是与时代的要求，与人民的期望，与外国人的研究相比较，我们的人数还不够多，眼界也不够宽广和深远，力量下得不够强劲和稳当，标准和要求也参差不齐，未必协调和谐。但只要形成气候，自然会排山倒海，锐不可当。

兰日旭著作完成，正值全国认真宣传落实中国共产党十八大精神和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之际，我除钦佩他的勤勉刻苦之外，又深感其研究之必要。我有幸一睹为快，既倍感鼓舞，又深感愧疚，只能以此不相干的一些话来搪塞。至于具体如何论述中外经济关系中的中国地位变迁与展望，请读者诸君安下心来详阅正本，是为序。

姚 遂

中央财经大学前副校长

2014年4月

好”的过去,主导中外经济交往的规则;如今我国经济发展所展现出的魅力及经济总量上快速超越西欧的事实,似乎又向世人表明中国有了一个“美好”的未来。当今中国在经济上的变迁,正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安吉尔·葛利亚(Angel Gurría)所指出的那样,“当历史学家回顾我们所处的时代时,可能会发现几乎没有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可以像中国的崛起那样引人注目。可是,当他们进一步放开历史视野时,他们将看到那不是个崛起,而是一个复兴。”^①因此,在追踪当前中国在中外经济交往秩序变迁的同时,从历史视角俯视中国在中外经济交往的演变历程,揭开中国曾经的辉煌为何会在很短的时间内陷入困境,被西方“军政”实力形式维系的世界体系所边缘化;之后,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为何又越拉越大,而一旦“苏醒”的中国又为何能很快融入到全球化的进程之中,重现经济发展的辉煌,而对于重现经济辉煌中所折射出的社会经济发展路径又属不属于像当前一些学者们所鼓吹的那样已经形成了一个“中国模式”,等等诸多谜团。我们有必要总结其经验,为当前中国在中外经济关系中地位的定位与今后的经济发展提供借鉴。“如果我们没有很好地理解我们曾经经历的状态,我们就不能很好地理解我们以后将会遇到的情况。”^②“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其现在可能的选择。要理解经济实绩随时间变化而显现出来的差异,就需要了解经济的演变。”^③这就是本书研究的现实与理论意义所在,更是本书主题所具有的问题意识。

1.2 几个相关问题

经济强国的地位,不是自封和被封的,而是在诸多因素综合作用下形成的。本书无法对影响经济地位变迁的因素一一详述,而是侧重对中国在中外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变迁历程这一主题进行探索,结果表明,曾经是经济强国的国家或地区都在一定程度上具

① [法]安格斯·麦迪森著,伍晓鹰、马德斌译:《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安吉尔·葛利亚(Angel Gurría)作“序言”。

② [美]道格拉斯·C.诺思著,钟正生、邢华等译:《理解经济变迁过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8页。

③ [美]道格拉斯·C.诺思著,陈郁、罗华平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中译本序。

1.3 研究结构

本书在充分考虑国内经济、政治等条件的基础上,围绕中国在中外经济关系^①中地位的变化^②展开,以图从中找出引起中外经济交往变迁的因素特征和规则,为当前重构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服务。一国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地位高低虽然受制于很多因素,但经济因素无疑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全球经济利益的

-
- ① 本文的研究,毕竟是以经济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在对外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变迁,因此,在影响地位变化的因素中虽然也提及政治、文化等因素,但根本上还是以经济为中心衡量、评判与其有关的问题,不会舍经济而转向政治等因素。
- ② 中外经济关系史是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但跟经济史其他分支或领域相比,明显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对中外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的研究,近年来虽有所发展,但仍显薄弱。”(王建朗,1999)这话虽然已经相隔十几年,但其观点仍有一定代表性;在此期间研究团队还集中在原有几个高校和研究所,主题也基本还是原有的近代化、贸易、投资等。故从已有的成果来看,与本书所研究的主题相比明显存在如下几点不足:一是在时段上,已有成果多数属于古代、近代和现当代中的某个领域,通史式研究鲜少。其中,古代中外经济关系研究相对薄弱,成果基本集中在“华夷观”(何芳川,1998;费正清,2009)、朝贡贸易(滨下武志等,1999)、古代贸易(孙玉琴,2008);近代中外经济关系的成果相对丰富:包括中外经济关系整体评价与中国近代中外经济关系(汪敬虞,1991),以及与近代中国对外经济关系有关的领域,如中国国际收支研究(陈争平,1996)、中外贸易研究(武培干,1928;何炳贤,1937;郑友揆,1984;陈争平,1999;孙玉琴,2008,等;其中有关成果亦可参见陈晋文《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研究综述》一文)、中外投资研究(罗默,1962;吴承明,1954;杜恂诚,1986;等)、技术引进(李约瑟,1954;杜石然、林庆元、郭金斌等,1991)、中外旅游业发展(张俐俐,1998)、中外近代化比较(章开沅、朱英,1990;等);现当代中外经济关系则是断代研究中最丰富的,几乎都与新中国的重要纪念年份相关,如新中国成立10周年、30周年、50周年、60周年、改革开放30周年,都有相关专题式论著出版与发表。有关中外经济关系通史式的研究极少,就从已有的《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史教程》(丁长清等,2011)一书的内容来看,该书也没有涉及有关中国在中外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变迁,其内容仍然是以贸易、投资、人员交往等为线索分阶段加以叙述。此外,就是在中国经济通史著作的某个章节中也对中外经济关系史中的某个部分有所涉及。二是在内容上,已有的研究成果侧重国际关系(何芳川,1998;王正毅,2000;沃勒斯坦,1998;等)、对外关系(马士,1957;张志宏,1990;章开沅等,1990;陈尚胜,2008;等)、外交史(王邵坊、吴东之、谢益显,1988;等)等视角,从经济关系的角度进行研究较少,且还以某一时段,尤其以中西分流之间为主,如《白银资本》(弗兰克,2000)、《大分流》(彭慕兰,2003)、《制度变迁与长期经济发展》(华民、张宇燕、文贯中等,2006)。三是在地域上,有关中国在中外经济关系中地位变迁研究的成果体现在国别或某一地区,如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张小明,2006)、中英关系(林庆元等,2006;)、中日关系(孙乃民,2006;等)、中美关系(陶文钊、何兴强等,2009),而从区域变迁整体考察的成果很少,且还以西方世界的崛起衰落为主、附带中国的地位变化(樊亢、宋则行,1998;高德步,2009;等)。总的来看,对中国在中外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变迁进行长时段、全球化等视角进行系统、全面的分析方面,学界研究尚不充分,仍存在着广阔的研究空间和现实与理论方面的需求。

第2章 “德治”维系的经贸交往圈

“现在的风气,一切都变为中国式或中国化了。椅、桌、炉、橱、镜框,甚至最平常的用具,无一不受中国的影响。”^①

在进入工业时代以前,全球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农业经济时期,农耕收入是当时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财富的多寡跟一个国家土地状况、人口多少、气候条件等要素与地缘政治密切相关。中国虽然与印度、埃及、古巴比伦等地区具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大河流域与冲积平原,为农业发展、财富积累、文化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但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还有一个相对有利的地缘政治格局:即东临大海、西南接高山峻岭、西向高原与沙漠、北面寒冷的西伯利亚,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铺垫了一个较为稳定的环境。“在整个历史长河中,中国没有遭到周边任何一个普天大国的挑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主张让中国感到有必要在文化方面给予严肃对待。”^②几乎没有受到外来大国^③的干扰,使中国社会能够持续而缓慢地发展,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文化。在这一相对隔绝的区域范围之内,中国又被一条“15英寸等降雨线”所分割,线以北以西地域为游牧区,线以南以东地区为农耕区,而横穿农耕区的汉文化发源地则被黄河、长江流过,富含泥沙的河水冲积地带逐渐构成众多部落繁衍生息区,成为中国农

① 英国的《世界杂志》,转引自方重:《十八世纪的英国文学与中国》,《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1933年第2卷,第1期。

② 史华慈:《中国的世界秩序观:过去与现在》,载于费正清主编的《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第298页。

③ 此处专门指具有较高文化载体的国家和地区。其他几个文明古国,如印度曾受到雅利安人、古希腊人、穆斯林的大规模入侵,而古埃及、古巴比伦等国或地区受到入侵的频率则更多,由此也影响到了它们文明的长期延续和发展。

结合的约束措施,而较少使用强制性治理机制,由此在中华帝国内部一开始就用“礼”来规范民众,而非平等立约,民与国之间的规范方式则依靠自上而下的、纵向的、稳定的“礼”制文化,从而既保证了“士农工商”的等级秩序,又通过“士”的选拔机制,即经过“学而优则仕”机制实现了“官—民”的共融。如此局面,出现了人人关心政治、受政治摆布的格局。自然,整个社会在“政治诉求”下形成一个“官道”^①的社会发展模式,并以此为隐性的动力引导社会发展,而在缺乏外来干预机制和周边国家(地区)竞争的时代,历朝政府对待社会的“官道”方式必然会从国内延伸到国外。传统农业上的较多积累、传统工业产品的技术领先,更使中国政府有能力按照自己的行为规则和现实利益去规范与之交往的国家与地区之间的关系,并逐渐构建起以中国为主导的“经贸交往圈”。

当然,中国多样性环境下特有的多灾特性,则很难在“人治”、“礼治”下实现长期的稳定趋向。毕竟,该体系的流通、稳定与否是无法完全建立在儒家“泛政治化”的软实力基础上的,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以农业为基础的赋税体制上的。在农业时代的中国,政府财政收支的盈余、短绌,与财政收入渠道的关系基本固定,其变化则取决于民生政策、开支领域的繁寡。财政实力雄厚之时,各朝政府有能力拿出更多的物质产品以“赐舍”与之交往的国家和地区统治者,实现“恩威并举”的效果,而受赐于中国的国家和地区则也能够从中国历朝政府中获得更多的物品或好处,从而使两者之间达到“双赢”的目的,即别国获取了更多的经济利益,中国则赢得了它们在政治、文化上的认同和尊重。财政短绌之时,中国政府与别国交往则采取严格限制的措施,减少交往的频率、规模,甚至推行“闭关”策略,以此保证国内的财政需求。由此可见,以中国为核心的“经贸交往圈”也无法完全建立在以经济基础为依托的军政维系的硬实力条件上,而更多时候则必须依靠“德治”来维系、规范、约束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关系。所谓“德治”^②维系,是指在对外经济交往活动中,中国主要

① 本人认为,自秦汉至今,中国历朝历代政府治理社会的方式基本都是从“官”的利益出发,制定相应的社会治理方式以维护自身利益,其治理行为、措施无不从“官”的行为和递升规则(考核标准)折射到社会关系的交流、生产、生活,以致对外交往的方方面面,成为社会大众的深层次行为规则或行动指南。此种思维方式,本文称之为“官道”。“官道”思维的长期存在和深化,严重影响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转型。至今,“官道”思维仍然影响着中国社会生产、生活、外交等的方方面面。

② 此处的“德治”主要是从中外经济关系的视角来判断的,而与众多对外关系史中从政治、外交、文化等视角所讨论的有所差异。比如费正清在其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6页)中所定义的就有所差别,“通过显示天子的德威,来发挥合乎准绳或思想意识的道德榜样的影响”。本书是在此定义上增加了一些约束性条件,以此对应后文将要提出的“军政”维系。

业社会或多或少都产生了效果,这些国家认为中国文化是先进文化,值得采用。”^①经济、文化等领域的诸多相似性特征,自然使中国与它们的交往易于采取一种相对不同于西北和北面游牧民族的策略,即实行建立在“德治”为表达形式的经济交往体系方式,突出的表现就是以“厚往薄来”为内核的单边经贸活动,即周边国家和地区以政治、文化对中国的认同而换取经贸交往的权利。自然,朝贡—互市贸易^②就成为双方之间经贸交往最为典型的形式之一。在这一交往圈中,中国强调的是中国在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优越性得到外围的认同,以及由此形成的等级观念,而对外很少主动去追求经济上的利益,即以无形的政治红利或崇高的名声为主,极少涉足经济上的红利。自然,在与这一区域的经济交往过程中,中国完全没有采取近代以来西方各国所常用的“军政”手段,进行强制性干预,而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和平思维来表达,即双方之间以汉化区来华经贸交流为主,中国在官方主导下则以长期逆差形式表达出来。此外,这一区域还应包括与中国存在地缘政治战略利益的西北地区,采取相对和缓的互市贸易,即在双方交界的地区设立互市,以各自所需的产品为导向(较为典型的是茶马互市),表面上各取所需,事实上仍然是以“厚往薄来”的形式谋求西北边境的稳定,同时,也使汉文化得以潜移默化地向此延伸和扩展。只是受两种文化、经济形式不同等因素影响,以农耕为核心的汉文化融合和渗透进西北地区的过程相当缓慢。在西北游牧区内,长期定居于此处的部落不像农耕区那样稳定,它们时常受新游牧部落^③的冲击而不得不向别处漂移,由此导致该处与农耕区之间的关系也不太稳定,经常发生冲突影响农耕区的格局,故中国较高文化水平的冲击也很难在漂移不定的游牧民族中扎根,大大约束了“德治”维系在此的执行力。农耕区出于内部稳定的目的,在大多数朝代都在这里驻扎了重兵,但以防范为主,

① [日]铃木中正:《中国与内亚的关系:匈奴和西藏》,载于费正清主编的《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第169页。

② 朝贡贸易制度萌芽于远古部落之间的“恩泽四方”,到汉唐则逐步形成了“朝贡”体系,到明代则进一步制度化。该体制是以朝贡—回赐和以中国为中心形成的两国关系呈现放射状网络的体制,其特征是以商业贸易行为展开活动,内涵通常由如下三部分构成:一是由贡使带来的贡物以及由中国方面对应的回赐物构成的授受关系;二是贡使的随行人员在官方指定的限定规模的北京同文馆内所进行的交易;三是伴随共识而来的商人团体在国境上所设的榷长或在沿海港口与中国方面商人进行的交易。由于朝贡贸易中隐含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所以众多的外国商人,尤其是中亚的商人,也往往把自己装扮成来自子虚乌有国家的虚假贡使,以此在贸易中获取种种额外的收益和权利(参见[日]滨下武志著,朱荫贵、欧阳菲译《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第29~44页的相关内容)。

③ 在西北和北面出现的游牧民族,在不同的朝代有着不同的核心部落,如汉代以匈奴,三国两晋南北朝则有多个部落,隋唐以突厥,五代十国两宋以多个部落,尤其是党项、契丹、后金和蒙古,明代以蒙古和满为核心部落,等等。

同,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该体系缺乏强制性约束、具有灵活多样的特征,而进入该体系却可以得到实质性和象征性的物质利益,同时,纳入到该体系的国家 and 地区的势力又无法跟中国抗衡。自然,“德治”维系的经贸交往圈在物质利益的控制下能够不断往外推进,加大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周边各国和地区市场之间的联系,成为早期全球化表现的雏形之一。

2.2 “德治”维系经贸交往圈的内在经济条件

“德治”维系经贸交往圈不是凭空出现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和平的延伸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能够在此区域内崛起,并成为区域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很大程度上是在相对封闭隔绝的地缘政治背景下,在传统农业在全国的渐趋形成及其相对先进的耕作方式向外传播中所积累的大量剩余、工商业的较早官办化、市场的由下而上的“泛行政化”等众多因素综合作用下的结晶。

2.2.1 “重本抑末”下的农业体系

农业不像工业、服务业那样,具备规模收益递增的特征,相反,深受自然条件的影响而呈现波动特性,同时在人地关系约束下又呈现规模收益递减的趋向。在现代技术发展起来之前,农业发展程度基本取决于自然条件和一些简单的耕作技术,即降雨量的多寡、土地的肥沃程度、农具的先进程度、耕作方式、水利设施,以及农业技术的传播情况。在此前提下,农业发展最好的地区或国家,必然集中在各大洲的河流冲击地带——尼罗河下游的古埃及、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恒河流域的印度以及黄河长江边的中国。而中国与其他三大古国相比,拥有相对优越的地理位置,即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缘政治格局。在现代交通通讯工具技术发展起来之前,外围势力很难大规模地进入中国,为此给中国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同时,中国早期先进的技术,尤其是印刷术、造纸术的领先地位,和来自中国历朝历代政府出于国内稳定目的而表现出的对农业重视的行为,无疑为中国的农业技术传播铺垫了很好的条件,这点我们也可以从农书的出版、皇帝所主持的各种仪式中得到佐证。在此条件下,中国传统农业逐渐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从而为中国“德治”维系区域经贸圈的向外辐射提

行调整,以达到“帕累托改进”的效果。这点集中体现在中国政府以资源稀缺性的条件出发,围绕土地制度展开各种维持社会稳定的变革活动之上。具体来说,在劳动力作为稀缺资源的时期,中国的统治者为了获取更多的经济剩余,大致上对维持了很长时间的“井田制”进行了改革,推动以土地自由买卖为核心的变革,以此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后来,随着秦统一中国,以及受之后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等因素影响,从北魏开始统治者又对土地制度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改革,即推行“均田制”,以促进土地的开发。之后,一直到隋唐都沿用了该制度。到唐中后期,随着人口的增加,社会资源的稀缺性因素开始发生变迁,此时,土地开始由早期的相对充裕逐步变成一种稀缺性资源;而人口则由稀缺性资源向剩余要素方面转化。为此,政府对早期的土地制度进行了较大程度的改革,废除了“均田”措施。宋元以降,随着人口增加速度的提升,政府为了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对经济资源的控制,又开始把土地制度改换为“限田”措施,力图以仁政姿态怀柔边疆、藩属以及周边国家和地区。同时,伴随土地制度的变化,政府还在人口密度大的区域主导了向外围区域寻找农田的活动。这点,主要表现在中国历朝的国内迁移事例中。在这些迁移中,中国政府不但鼓励人口密度大地区人口向地多人寡处迁移,给予迁出地的居民移出所需的资费,迁入后授予土地、贷放种子、提供耕畜和其他一切信息。同时,在政策上也在人多与人少区域之间有所差别。田赋政策,“一方面,法律对江南和另外几个富足地区规定的沉重赋额不对其他地区征收;另一方面,实际政策允许很多新定居或重新定居的区域继续停留在纳税名单之外。”^①而政府对“食物骚乱的反应,表现了国家负有双重的任务:一方面是稳定地方粮价,另一方面则是将粮食从低价地区转移到高价地区”^②。均衡发展的策略,基本保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此外政府利用国家政权力量和道德教育等手段,巩固以“男耕女织”为分工的家庭兼业基础。政府除了在粮食方面给予各种支持外,还在纺织等方面提供种种帮助。早期中国政府给予民众提供麻、桑等种子和纺织技术,后期则分发棉花种子,刊发指导书籍,推动相关技术的传授,以及促进和推广节省土地的创新技术。同时,对家庭妇女的纺织行为给予高度的道德暗示和评价。如在《三字经》中提到的“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的典故就从侧面暗示在家纺织的重要性;而女儿出嫁时必备的“女红”技术则体现了社会对女性纺织的极高期望。

① [美]彭慕兰著,史建云译:《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4页。

② [美]王国斌著,李伯重、连玲珍译:《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67页。

序地发挥到工商业上,再伸展到服务性质的事业,有如保险及律师之雇佣等。”^①在几乎封闭的社会结构中,单个家庭难以集聚起发展工业所需的资金,因此,中国家庭企业尽管相当发达,但基本集中在与自身“衣食住行”相关产品的兼业功能上,而不是为了市场进行生产,自然很少能够发展成为规模较大的手工工场。由此,我们也可以从企业组织形式的变迁中得到部分佐证。中国的企业组织形式在漫长的2000多年的演进中一直停留在独资、合伙范畴之内。明清之际的十大商帮,尽管也发展到一定规模,并出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部分分离倾向。如日升昌成立后,股东对总经理候选人进行严格考察,确认其德才兼备、多谋善变、能攻能守,能够胜任该职后,重金加以聘任,委以全权。而总经理对票号的资本运用和人事管理全权负责,从营业决策、分号设置到人员选用、调配、辞退等都由总经理说了算,股东并不加以干涉。据《平遥票号史》记述日升昌首任大掌柜雷履泰(以下简称雷)生病时,受二掌柜毛鸿翔影响,东家请雷回家休息,结果出现“东家去看雷之病,见案头写下许多撤回各码头分庄的书信,便警问其故。雷曰:字号是你的,各码头分庄是我安的,撤回来我要交待你。李东家再三请求收回此命,雷只是不允,东家下跪曰:你不答应我的请求,就不起来了。雷见此情形不得不允曰:起来吧,让我回家谅非你的主意。雷虽答应不再收撤分庄,但久不至号视事。东家每日派伙计送酒席一桌,银子五十两”^②。由此可见,东家在任用总经理以后,票号的经营事务完全是由总经理裁决,东家即使受到某些因素影响而有所干预,也可能遭到经理的不满和抵制。由此形成的资本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分离,企业经营管理的权力已经过渡到了经理手中,出现了出资者享有资本收益权,经营者占有控制和经营管理权。当然,严格来说,上述权利的分离仍然停留在原始物权阶段,是合伙制的延伸^③。由此可见,中国企业的几千年发展,企业组织已经出现了股份合伙等形式,而财股与身股的形成,似乎仍属于“收益分配意义上的‘股份’划分”,“其影响力及实际意义似乎反而盖过了资本意义上的‘股份’划分”^④。显然,此种形式的企业组织与现代企业组织形式还存在很大差距。由此,我国就出现了企业规模的扩大受到股东与顶身股的经营者之间利益博弈的限制,使股东在企业投资上陷入了“内敛化”的趋势之中,难以以有限的资金做大做强某一个行业。同时,受传统习俗等因素约束,中国民间即使

①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62页。

② 中国人民银行山西分行,山西财经学院,黄鉴晖编:《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

③ 兰日旭:《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变迁及其绩效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一章内容。

④ 张忠民:《艰难的变迁》,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页。

官员服从。商人缺乏自己的辖区,出任地方官市镇顾问作为避难所。16世纪,城市迅速发展,却完全没有自治权。”^①

上述三层贸易活动圈,我们可以用图2.8加以表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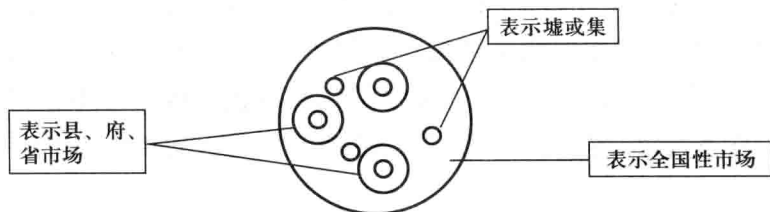


图 2.8 中国古代国内贸易圈

图中各个小圈表示分布在全国各地的集或墟,由一些集或墟构成中级贸易圈,而在中级的基础上形成全国性的贸易网,而这些网点所在地则基本都是中国各级政府部门的驻地。显然,由此构建的市场基本是由政府通过税收、专卖及其他手段来操纵的,国内贸易网的功能亦体现出以税收为核心的土特产品的征集和交易,而不是西方那种通过经济功能自然形成的地区市场或区域市场。中国国内贸易的政治性特征,为各级政府提供了一个筹集各地物品的渠道,也为中央政府集中全国的地方特产和物品铺平了道路,最终替中央准备了“德治”分配体系所需的各种物品。自然,中国这种以政治权力为核心自上而下延伸扩展的市场结构,与对外经贸交往网络基本一致,为周边国家和地区进入中国提供了一个可资利用的网络。近代之后,尽管也发生了某些变化,但基本上只是受到交易成本的影响发生的商道变更,而不是受到西方武力等强制性手段而改变的。

二、市场功能无法正常化的缘由:资源禀赋与政策之间的悖论

中国的内部贸易开端很早,在夏朝时就出现了“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②的现象,但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却仍然停留在小范围内,市场规模没有得到有效的扩大,难以形成全国性的市场。尽管造成这一现象的因素有很多,但从深层来看,其实就是资源禀赋与政府政策之间的悖论。

1. 资源禀赋的差异促使了贸易的发展。具体来说,资源禀赋的地区差异,一方面为

^① [美]魏斐德著,邓军译:《中华帝制的衰落》,合肥: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黄山书社2010年版,第43页。

^② 《易·系辞下》。

庶政之发展,期财力之增加,语其进也。量入为出者,藉财政之约束,防庶政之滥施,语其退也。欧美取乎前中国取乎后者,数千年立国之本不同,彼在强国,我在安民,财聚于国利于强,财散于民利于安也。”^①自然,中国财政体系长期偏好于税收共分制与辅助制和附加制的混合方式。

中国财政收支的上述特征,实际上都是出于中央集权目的的需要,由此确保中央所设想的以“天下一四夷”为核心理念的“德治”结构的施行。“德治”维系的延伸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厚往薄来”的经济手段,自然,为了维持经贸交往格局的稳定性和不断扩大,中国政府自秦汉开始就一直维系着集权式的财政体系,有时出现财政的地方分权,则是“为了实现中央政治集权的这一目的”;同时,“中央政府通过监督、激励机制影响地方政府的行为,使其成为中央政府谋求财政收入最大化和实现政治稳定的工具。”^②财权高度集中于中央的偏好,显然为中国“怀柔”外围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条件,使中国不用依靠现代西方那种“军政”手段就可以实现“德治”维系的目標。

2.3 “德治”辉煌的例证：丝绸之路与郑和下西洋

中国“德治”维系经贸交往圈的形成与扩散,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中国政府较多的农业剩余和较高技术含量的官办化手工制品的对外惠赐实现的。在这一体系中,中国虽然根据自身的政治利益偏好构建了一个围绕自身利益的交往规则,兼及对外经贸交往活动,但从它萌芽到近代的崩溃,中国几乎没有以经济利益来衡量该体系的成本与收益,同时也几乎没有让民间主动参与到该体系的交易活动之中。

2.3.1 中国“德治”维系下的经贸交往状况

中国跟国外的贸易,实质上是在国内贸易基础上的民间私人贸易^③和政府“德治”分配体系的延伸,具有政治外交下的附属性特征。具体的贸易活动大致通过陆路、海路展

① 林绪武、邱少君编:《吴鼎昌文集》,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② 朱红琼:《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及其变迁史》,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

③ 民间的参与,很大程度上是在官方主导的贸易活动中的“溢出”。该种交易模式,一方面通过官方主导的工商业活动以一定的条件允准民间参与工商业的某个环节而增加财政收入,另一方面民间的参与又可以降低政府交易的成本。

年。顾何以哥氏、维氏之绩,能使全世界划然开一新纪元。而郑君之烈,随郑君之没以俱逝。……而我则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①学者对郑和大规模航海的动力有着多种看法,比较令人认同的有如下两种:一是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以寻找失踪的建文帝,与西洋诸国发展“敦睦邦交”,即“……除了有顺带侦缉建文皇帝的用意以外,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发展和‘西洋’一带的友好关系。……下西洋的宗旨并不是为了发展海外贸易。……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发展和亚非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②。二是扬威海外。当然,如此规模庞大的航海活动为何举行多次,仅凭上述动机显然有点牵强。毕竟,郑和时代,中国国内已经在北方逐步构建起一个防卫元朝残余势力的军事网络,东南沿海则相对承平,经济开始获得了较大发展,似乎有了“资本主义萌芽”的迹象。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大促进了商品货币的发展,使国内对金银等贵金属需求加大,而中国却是个金银缺乏的国家。据彭泽益估计,我国白银的年产量到1800年前后也不过439 063两。^③自然,要适应经济发展货币化程度日益深化的趋势,必然要在货币上有所诉求,而朱元璋的设想则与此相反。这样,政府货币制度上的短缺与经济发展之需、祖宗成法的不可变更等因素,就成为明成祖积极发展海外探索以获取金银等贵金属的最佳出路,即“西洋取宝”。

伴随明政府内部对金银等贵金属的需求增加,郑和先后七次大规模的航行,虽然在空间上横跨亚非洲,但在实践中却极为不幸,没有发现或接触到富有金银等贵金属的地区。而对于以农业经济为主要税收收入的国家来说,显然难以维持和承担长期的、大规模探索和宣威活动。因此,当来自北方残余势力不断干扰中国广大北方之际,明朝政府便断然停止了主动出海寻找贵金属的动机,以谋求政权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小 结

中国“德治”维系经贸交往圈的延伸、扩展与运作,实际上是隐含在政治、文化与外交的外衣下,是以中国传统农业不断扩散和耕作方式精细化、工商业官办化、市场“泛行政化”的条件为基础的,即建构在较强的经济实力和财富积累的前提上。当传统农业在全国的形成

① 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新民丛报》,1905年第21期。

② 张维华:《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83~284页。

③ 彭泽益:《鸦片战争后十年间银贵钱贱波动下的中国经济与阶级关系》,《历史研究》,1961年第6期。

第3章 “军政”体系下的边缘化格局

“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中国人民有自己的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①

“德治”维系经贸交往圈下的中国权力扩散与收缩基本与国家财政收入可能性边界呈正相关,自然,在缺乏规模报酬递增行业支撑的财政收支条件下,中国的文化扩散体系很难持续,往往呈现出一种以政权强弱为核心的周期性波动趋向。在这一演变的过程中,处在“德治”维系经贸交往圈中心地位的中国历代官僚阶层,由于长期缺乏周边国家或地区强有力的竞争,在中国内部难以产生一个“竞争择优”的机制以推动国内制度的优化,自然他们会不断地强化官僚统治的格局,努力维护社会等级秩序和社会的稳定化趋势,以巩固和强化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面对长期的超稳定格局和政治、文化优势,中国自然在历朝官僚阶层内部形成了一种虚幻的优势陷阱,“对整个中国历史加以观察,即可发现这个多面相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是在不同的时间,由许多真假程度不同,有时甚至子虚乌有的‘事实’构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82年9月1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元化等成果的武装下,展开航海运动,以图通过横渡大西洋到达东方的中国,寻找自身所短缺的各种物品。“在自然世界或人类世界,所有复杂的历史过程都充满了各种偶发事件或意外事件,这些事件使得以后的活动格局会以新的方式形成。”^①“寻找”动机下的新航路运动,并没有实现欧洲人到达中国的目的,而意外的是,它们的船队先后到达了新大陆,掠取了大量金、银等贵金属。这一偶然的事件完全改变了欧洲社会的发展历程。在短时间内,外部大量输入金、银等贵金属货币却给西方社会的原有经济结构带来了巨大冲击,改变了财富在社会各阶层中的分配。16世纪以来,在欧洲内部长期的价格革命影响、受通胀约束而产生的收入分配机制的作用下,那些在“意外”事件中暴富的新兴社会阶层,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必然会利用“经济换政治”的方式,以重构原有的政治格局。经过长期的抗争,西欧内部实现了政治权力在不同阶层的重新分配,加上工业革命的爆发,最终促成了西方诸国资本主义的兴起^②。这一过程,“西方的学术,西方的心理,西方的制度建设,乃至一切都离不开其赫赫武功”^③,“强大和集中化的国家对欧洲核心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不可缺少的,而哪些能发展成强国,哪些却发展为较弱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尽管不是绝对)是对国与国之间军备竞赛的反应所带来的后果,而非因为既有的经济条件。”^④显然,是借助“军政”手段的不断往外扩展来实现的。“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

① [美]王国斌著,李伯重、连玲玲译:《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7月第2版,第2页。

② 有关西方世界的兴起原因,学界存在很大争论。大致上有着如下六种观点:诺斯的“制度决定论”、沃勒斯坦的“国际剥削论”、布罗代尔的“技术决定论”、麦戈伊的“文化技术决定论”、马克斯·韦伯的“新教决定论”、彭慕兰的“资源决定论”(参见华民、韦森、张宇燕、文贯中等:《制度变迁与长期经济发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事实上,根据我的理解和推断,西欧的兴起跟它的地缘政治格局密切相关:欧洲长期表现出一个众多国家或地区共存的局面,必然会迫使每一个国家或地区不断在制度等方面展开竞争,创新原有的制度等,以确保自身的优势,而别的国家或地区则对新的制度等因素不断模仿,从而形成一个“创新与择优”共融的发展局面,这是欧洲崛起的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则如正文中提到的在中国“资源组合”下展开的“寻找商品”——偶然发现市场——满足市场需求——“寻找内部制造”的转变。内外因素的结合,在“军政”推动下,通过欧洲内部工业化的前向、后向联系,以及扩散效应,最终把整个世界都纳入到西方主导、“军政”维系的世界体系之中。

③ 张木生:《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7页。

④ [澳大利亚]琳达·维斯、约翰·M.霍布森著,黄兆辉、廖志强译:《国家与经济发展——一个比较及历史性的分析》,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13页。

对立中的农村角色,即“工业西方、农业中国”;而西方则凭借强大的军政实力,自主地构建了一个适应其自身经济发展的经贸交往网络,在中西交往中长期占据了“制度红利”,不但规避了国内资源等方面的缺陷,而且还使西方各国在对外经贸交往过程中不断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占据着经济发展的核心技术和要件,长期保持着自身的经济领先优势。

3.2 “闭关”^①背景下的边缘化宿命

中国在“德治”维系经贸交往圈的地位逐步被西方“军政”维系的世界体系所分割、利用、替代,并最终被挤出中心,而沦为“西方中心”体系的一个边缘化组成部分。所谓边缘化,就是指原先处在对外经济贸易交往中心的中国,渐趋被纳入到西方“军政”维系的世界体系之中,相应地,中西之间经贸交流的规则也由中国制定向西方主导转变,中国成为西方主导国际分工中的一个被动参与者,无法享受该体系中的制度红利,只能按照规则参与其交易和充当依附者的角色,获取极少的“比较利益”溢出成果。显然,中国在对外经济交往中地位的颠覆性变迁,不是偶然的,而是国内社会经济因素与国外经济形势综合作用的结果。长期缺乏竞争对手的地缘政治格局使中国内部形成了一个超稳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在遇到外部冲击之际极易采取“封闭自守”思维加以应对,同时国内统治者为了维持自身的优越地位和社会等级秩序则容易陷入到“内敛化”的发展模式中;对中国产生强烈冲击的西欧则长期受高度竞争的地缘政治格局影响,普遍存在生存危机,因而在现实中产生了一个拥有高度创新活力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了发散性的发展思维。中西发展思维和路径选择的差异,最终成为中西经贸交往格局或交易体系的颠倒性变迁的基础。

① “闭关”包含了具有两个不同表现形式的时期——明清之际自主缩小与经贸交往圈之外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是非汉化区)的交往时期和《江宁条约》签订之后的被动“开放”时期。前一个时期基本是在国内经济因素约束和外围的不断深入、冲击压力下,明清政府自主地做出的“被动”反应的结果;后一个时期则完全是在西方列强“军政”维系的武力打击下被动地做出反应的结局。

3.2.1 农业发展中的困境——人地紧张关系下的“内敛化”

“在那个世界中,几乎一切食品、燃料、衣物纤维和建材都来自于植物种植,从而来自于当年的阳光、水分和土地的交互作用;在那个世界中,即使极为大量的劳动和资本也只能提高某一块已知土地的产量;也是在那个世界中,欧亚大陆的两端都突破了此前已经保持千年以上稳定的人口上限,发现它们本地的土地供给受到了令人痛苦的限制。”^①在传统经济结构相对简单的背景下,人地关系紧张制约了长期经济发展的路径,引发中国农业发展逐步走上一条在有限土地基础上的精耕细作和家内兼业相结合的发展道路。在社会结构向“官—民”二重结构演化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现代化的赋税体系,以小农经济为核心的财政制度无法支撑以中国为中心的经贸关系的进一步扩大,反而到元朝之后选择了一条“闭关自守”的发展路径。然而,“闭关”并不能解决国内“人地紧张”的问题,只是部分延缓了社会危机的来临。在此过程中,中国的农业发展像西方国家一样,不断地陷入到“马尔萨斯陷阱”之中。“西欧最发达地区远非独一无二的,它们看来与欧亚大陆其他人口密集的核心区域有着共同的重要经济特征——商业化,商品、土地与劳动的互相修正,市场驱动的发展,家庭根据经济趋势对其生育和劳动力配置的调整。”^②大致上,在15—16世纪,中国与西欧都出现了以“勤劳革命”为表现的“马尔萨斯陷阱”。

“当孩子是一种资产时,生育率往往是很高的,而在土地丰裕的社会里,私人和社会的成本收益几乎是相等的。但是一旦全部好地被尽行占用,而收益开始递减时,私人和社会的成本收益便截然有别了。”^③人地关系紧张引起的私人和社会成本收益的差异,不仅反映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部,而且也反映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发展路径的选择上。中国在农业经济发展中,一方面向劳动密集型的精耕细作与家庭手工业发展,显现出日益“内敛化”的趋势;另一方面则在人口密集的地区逐步突破了传统“重农抑商”与“固土不迁”的藩篱。明中叶之后,不但从事商业的人数大幅增加,渐趋形成十大商帮,推动以日常用品为核心的物品长距离的交易,部分实现地区经济产品的交流,而且国内

① [美]彭慕兰著,史建云译:《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中文版序言,第4页。

② [美]彭慕兰著,史建云译:《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页。

③ [美]道格拉斯·诺思、罗伯斯·托马斯著,厉以平、蔡磊译:《西方世界的兴起》,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页。

失了早期在世界市场上占据的绝对优势。这点,我们可以从图 3.7 中印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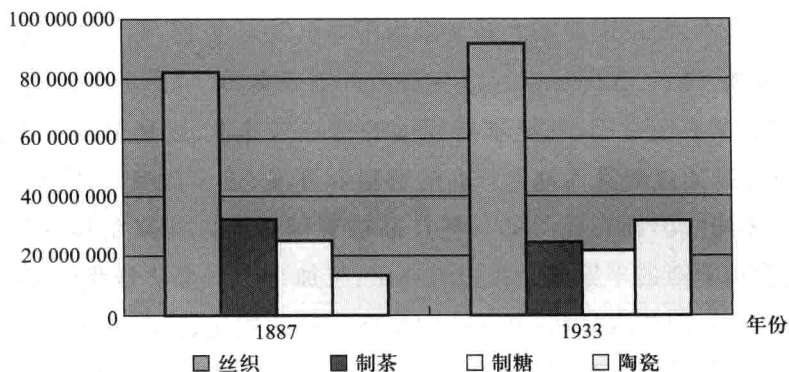


图 3.7 中国部分传统工业产品出口波动图(单位:1933 年元)^①

伴随中国传统优势工业的渐趋分化和出口市场的萎缩,以及西方工业化的日益成熟和发展,自然,中国在西方工业品的倾销下呈现出向边缘化的角色转换。中国在对外经贸关系中的地位也由过去中国单方面的产品、技术出口为主转向成为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原料来源地和工业产品的倾销地。

3.2.3 一关一张的中西分化

中国以重农主义为主张的策略,与西方 16 世纪以来的重商主义的现实碰撞,使中国在赋税刚性的条件下,逐步缩小对外经济交往的区域范围,以此跟“德治”维系的经贸交往圈规则和国内经济基础相适应。在此背景下,中国逐渐走上了封闭的自我防御之路。

1. 闭关与中心扩张的中断

“有明一代,中国的人口增长了一倍多;商人们正在将生产者 and 消费者引向地区性和全国性的商业网络,没有这种网络,生产者和消费者谁都无法生存;商品出口将日本和西班牙的白银吸引到中国市场,使明朝经济得以良性运转;新的财富影响着信息传播

^① 刘佛丁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52 页。